

# 貌似一样怜才曲，句句都是断肠声

——《李宗恩先生编年》读后

作者：章诒和

(上接2月16日 第B4版)

## 二、硝烟

转眼到了1944年的冬季，日军节节西进，由广西逼近黔省，贵阳一夕数惊。省政府命令各机构和市民疏散，贵医决定迁往重庆歌乐山。没有汽车等运载工具，长途跋涉只有徒步而行。李宗恩把自己仅有的黄包车卸下两只轮盘，给同学们用来拖运行李。“在动身的那一天早晨（12月7日），师生齐集附属医院门前空地。天气阴沉，寒峻的北风吹得房屋在战栗，也吹去心头的温暖，大家有说不出的悲凉与凄清。（李）院长在一个简单的演说以后，哽咽着喉咙，流着眼泪，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‘我们来唱——唱一个校歌。’在场的人已是泣不成声。”师生们并不恐惧日本人的凶暴，也不考虑个人的安危，之所以痛哭是惟恐这刚长成的贵医因经不住狂风暴雨而枯萎凋萎。

在战火中遭遇苦难，在苦难中坚持不懈，国立贵阳医学院以“永远独立”的风姿完整地保存下来。李宗恩尽管承受许多周折乃至误解，但他懂得作为一个院长的第一意义，就是负担起自己的责任。出色的业绩，使他荣获了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的“抗战胜利勋章”。获此勋章的，有数十位国民党高级将领：何应钦、程潜、阎锡山、冯玉祥、李宗仁和白崇禧等，也有有八路军的三位将军：朱德、彭德怀和叶剑英。

在此期间，朱家骅、王世杰二人以介绍人身份为李宗恩办理了国民党党员手续。按照当时的规定，学校的校长、教务主任及训导主任应是国民党党员。为了千辛万苦办起来的贵医，李宗恩接受了这个事实。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——此后二十年，在反复的政治历史审查中，却不得不一次次地面对这个“事实”。

抗战结束，恢复协和的事宜立即提到日程上来。经费方面由美国资助；董事会是中美成员的组合；管理方面则明确要求一个全职中国院长，一个美国副院长，皆由协和董事会选出。被提名的中国院长候选人共有十一位，包括刘瑞恒、林可胜、张孝骞、李宗恩。1947年3月12日协和董事会在上海召开会议，选举李宗恩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任中国院长，Dr. Alan Gregg 为副院长。

3月23日，李宗恩电告胡适：“I feel unequal to the great task which the PUMC

Trustees did me the honor to entrust to me. I beg you to give me one week to enable me to think over the matter carefully and to make arrangements for the Kweiyang Medical College affairs before I can make any final decision.”（译文：协和董事会的任命以及给予我的荣誉和信任使我感到力所不及。请允许我要求一个星期的时间给你最后答复，让我认真考虑如何安排贵阳医学院的工作。）

3月31日，李宗恩给胡适电报，表示接受任命。时任董事会主席的胡适对李宗恩的人品、学识和才干，深信不疑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：“在你的领导下，我们相信，新协和将会像过去一样，对中国的医学教育做成重要贡献。对此，你将有我们的信任和支持。”

这个在协和任教14年的人担任院长后，便拿出全部精力从事“复校”工作。

恢复一所医学院，钱乃首要之事。美国洛氏基金及时出手，决定继续采用一年一度的拨款方法。李宗恩最头疼、最棘手的事就是管理协和的财务。当时汇率极不稳定，为了交涉美元和法币的兑换率，他与中央银行总裁张嘉璈打了无数交道。日记里，李宗恩甚至详尽地列出汇率的计算方法，而这样的预算计划则是他每个月的“作业”。难怪美国方面感叹道：“世界上没有任何医学院的预算，像协和医学院的预算那么复杂。”

与钱同等重要的是人。恢复后的协和，该怎样办学？李宗恩极为明确的想法就是保持“协和标准”——即“教学质量高于一切”。除了聘请国内外医学家担任客座教授，协和以自身巨大的吸引力、影响力，把战争时期散落各地的资深医学教授都“搜索”回来。经历渺渺程途，跨过滚滚长江，聂毓禅带着几十名学生，走过1900公里行程，由成都回到北京；妇产科专家林巧稚于1948年5月回到协和妇产科；秋天，内科专家张孝骞从“湘雅”返回协和，担任内科主任。师生踏进协和大门，眼前一片残缺：设备找不到，病床十五张，唯有绿瓦灰墙保留着旧日景象。来不及休息，大家放下行囊，就着手重新开课。这些一流医学家表现出“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”的英雄气概：到库房查找可用的设施；把拆散的仪器拼接修理起来；把校舍重新打扫刷新；向董事会提交购买新锅炉计划；签订全年燃煤合同；为讲



1948年9月23日，李宗恩（第四排左起第三）参加第一次中研院院士会议。

授人体解剖学，跑到北京大学“借”尸体。艰难之中，协和以不可思议的神奇力量，迅速恢复生机。这两年在协和历史上，被称为“白银时代”。

白银时代，夺目而短促。

## 三、去留

常听人这样说：“谁让他们（指老一代高级知识分子）不去台湾！结果呢，戴帽的戴帽，划右的划右，下放的下放，惨死的惨死。后悔吧？要是早早去了台湾，一辈子不会倒霉。”枯鱼过河泣，何时悔及。这个“早早”是指政权易手的前后，而“你们为啥不去台湾”则成为大陆一个久久议论的话题。是走还是留，这句话就像哈姆莱特“生存还是毁灭”的台词一样，无休止地提出。

1948年，国民政府有个“抢救学人”活动，即胡适、傅斯年亲自出面动员一些顶级学者教授离开北平，飞赴台湾。其中被他们动员的人物里，最有名的一位叫陈寅恪。胡、傅等人多次劝其南下、东渡，陈寅恪夫人还曾一度滞留香港。但最终未赴台，他拒绝了，落脚在广州。1949年后，上面几次派专人来广东，恭请陈寅恪赴京，他拒绝了，尽

管新政权有多个重要职务和头衔在虚席以待。

在国民政府开列的名单里，也有李宗恩。他也回绝了，说自己要留下。他们当时为什么要留下？此后，许多人不停地追问？包括今天的年轻人。写李宗恩过程中，我也思索这个问题，还向别人请教。归纳起来，是否有以下几点：

一，这些学者、科学家绝非一人东渡，独自飘零。他们要带上一大家人；要带上半辈子积累的书籍、资料；要带上所有的家私；要带上舍不得丢弃的零零碎碎。一句话，奔赴台湾就意味着连根拔起，永不回头。而不伤一枝一叶地“移栽”至台湾，需要一大笔钱，需要充沛的精力，需要人力和帮手的，需要埋葬许多珍贵的感情，需要扭转许多习惯，需要割断许多良好的关系……还有永远带不走氏族血脉、乡土老宅、饮食口味、兴趣爱好，以及长满青草的坟。远非两张机票，一走了之那么简单。这些严峻冷酷而又极其现实的问题，是阻止远行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之大、之细、之深，可以压倒一个简单的政治判断。

——待续——  
(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。)